

孙科三任广州市长

王 军

1921—1926年，孙科曾三任广州市长。这期间，他为广州市的兴革与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。广州建市的理念及实践也为后来民国时期的都市建设提供了模式。

1920年，陈炯明驱逐了桂系军阀莫荣新后，被孙中山任命为

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。陈炯明为提高自己的声望，下令在广东省和广州市推行地方自治。经廖仲恺推荐，孙科被任命为“广州市政公所”督办。

广州市政公所是1918年11月由南方军政府设立的。当时由杨永泰任督办，魏邦平任会办。市政公所的主要任务就是拆墙筑路和建立公园等，至于教育、娱乐等

内容都还谈不上。

孙科任督办后，感觉市政公所的任务过于单纯，规划也欠健全，且事权又漫无标准，这对广州的发展势必产生不利影响。于是便向陈炯明建议，主张另建新制，以组织一个现代化都市的市政系统。

对于另建新制，孙科非常有信心。他早年在美国加州大学读

精神，谈不到救国自强。”最后，他还号召说：“我们东北大学学生，有他的特殊使命——回故乡。”要担负起“复兴民族的使命”，要常到农村去，“作将来可以和民众打成一片的准备”。西安事变后，东北大学学生成立了国防化学研究班、通讯班、侦探班和战时准备讨论会等，训练群众，作抗战准备。为了唤起民众，组织民众，训练民众，他们还成立了救亡歌剧团、宣传队和组织队，走出校门，深入民间，协助民众开展救亡工作。

1937年1月，国民政府强令将东北大学改为国立，并任命了新校长，将学校迁往河南开封。东北大学大部分师生拒绝将学校改为国立，开展了护校斗争。最后，随学校赴开封报到者只有一、二百人，大部分学生被校方以各种借口开除。

1949年初，北平和平解放，流落到此的东北大学在总务长、留美理学硕士崔九卿率领下迁回东北。原东北大学文、理、法商三个学院780余名师生并入

解放区东北大学（后改为东北师范大学），工学院留在沈阳，即东北工学院（现更名为东北大学），农学院留在哈尔滨，现为东北农业大学。

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东北大学校友天各一方，但是，昔日的辉煌无法从记忆中抹去，无论在大陆，在美国，还是在台湾，东北大学的校友们组织在一起，整理着记忆，缅怀着校长。1989年3月，张学良曾亲笔复信“中国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”会长张捷迁教授，固辞派人去台为他祝寿。信中说：“诸公对我如此深厚友爱，我十分了解，我也十分惭愧，诸位也能会了解我的心情和处境，我已习惯于静默安居，逍遥自在。”张学良还向在美的东北大学校友表示：在美诸人也不是很富裕，不必去台为他祝寿，如果有力量，可以为国家办点实事。

现在，东北大学业已复校，张学良被聘为名誉校长。人们在盼望、盼望着老校长踏着70年的风尘向他们走来，了结这70年的未了之情。

书时都对都市计划问题就有浓厚兴趣,并修了不少关于政府组织及市政工作的课程,还利用业余时间参观了美国不少城市的市政建设。他回到广州后的第二年(1919年),就在当时作为国民革命喉舌的《建设杂志》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都市现代化的文章——《都市规划论》。孙科认为,在规划都市发展时,有两个步骤非常重要:首先政府应对整个城市的经济、人口、职业、交通和地理等情况作一完整的调查,并将调查的结果作为政府制定市政计划的依据;其次,在调查时,对一些诸如公共卫生、娱乐场所等具体问题要详细考虑,以使计划制定的更加完善。孙科还认为,为了稳定人事、节省经费,且保持市政发展的连续性,都市的领导者即市长,最好要有适度的任期。孙科的见解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,这恐怕也是他后来成为广州市市长人选的重要原因。

为适应广州改制的需要,应制定一章程作为治理广州、发展广州的依据。为此,孙科起草了《广州市组织条例》,共计57条。《条例》经陈炯明和廖仲恺同意后,送交省议会审查。按《条例》规定,广州市长和参事会人员由省长任命而不经普选。省议会认为这不合乎民主原则而拒绝通过。为此,1921年3月14日,孙科亲自答复省议会,为条例辩护。孙科认为普选在目前的中国还无法实行,他建议实行一种“平民方式”的方法,即先由政府任命官员,将来再逐渐改为普选。这样,在陈炯明、廖仲恺的支持下,也在孙科的力争下,《条例》得以通过。新条例施行后,由省政府下令,市政公所

改为市政厅,后改为市政府;市政首长,由督办改为市长,孙科成为广州市的第一任市长。

新《条例》的颁布,使广州市政府的职权,不再仅限于拆墙筑路上,教育、公共健康和公共工程等也都列入市政府的职权范围。在职权分配上,按《条例》规定,市政府除秘书处外,还设立了公安、财政、教育、工务、卫生、公用等六局,这其中“公安”和“公用”一词均为孙科首创,且后来一直沿用未改,公用局主要掌管自来水、电灯、电话和交通车辆等。六局各设局长一人。市长、六局局长连同所属有关主管人员,合组成市行政会议。凡各局所属提出的建议,或施行时发生困难,或事权涉及二局以上引起争议,而市长不便或不愿独断解决时,均可由行政会议决定。除市政府这个行政部门外,还设立了两个独立的监察机构——审议室和市参事会。

广州市政府成立后,为了使市政工作有新的起色,避免以往的官僚恶习,孙科作为市长,在部属的人事安排上非常慎重。他没有依照惯例从省政府或从前的市政公所里选人,而是任命留学生来作六局局长。此举尽管遭许多人非议,但从后来广州市政府的初期业绩看,这些人的确努力工作,富有朝气,且有创新精神,为广州的建设作了很多贡献。

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市参事会员的选举。按《条例》规定,广州市的市参事会有30个名额,这其中,10名由省长任命,10名由选举产生,10名由社会各界分配:市商会和劳工组织各3名,教育、医学、法律、工程界各1名。市参事会员的选举定在1921年6月

1日,当时参加登记的选民只有2.6万人,还不到广州市合格选民的1/10。即使如此,选举还闹出了笑话,一候选人竟得了3万票。由于这次选举的结果,广州以后的选举暂停。

二

孙科初任广州市长是在1921年3月至1922年6月,共计15个月。孙科将第一任期内的主要工作放在市政建设上,希望广州的市容市貌能有大的改变,以便为建设近代化的都市创造条件。因此,市政府的工作首先仍是筑路拆墙。因为要规划新的城市蓝图,修建新路或拓宽马路,旧的城墙不拆除,沟壕不填就无法实现这一目标。在这项工作上,孙科遇到了重重阻力,尤其当市政府决定拆除一个据说是汉代遗留下来的一个钟——“铜壶滴漏”时,遭到了绅商阶层的反对。认为这是在牺牲他们的利益,而且认为移动古迹,会破坏广州市的风水。他们鼓动一些人进行示威。孙科一面前往疏通解释,一面顶住压力。在他的推动下,广州市在拆墙(房)填沟的基础上,修建了近26公里的现代道路,街道拓宽了2.5—5米(包括人行道),新路均用水泥铺造。

除筑路拆墙外,市政府在推行教育方面可谓不遗余力。为提高市民素质,使广州向近代化都会迈进,教育局宣布对国民教育要加以强迫,并专门组织了国民教育强迫委员会来执行。同时,教育局设立了各种职业训练学校和成人教育学校。随着市府国民教育计划的推行,广州市相继建起

了商业学校、妇女裁缝学校、师范学校和工人学校。此外,教育局还利用公共图书馆和“市民大学”来扫除文盲。“市民大学”并不是正规的学校,晚间授课,通过一连串的演讲向百姓传授知识。孙科曾亲自在“市民大学”上课,并邀请汪精卫、胡汉民等国民党党政名流来演讲,内容有社会科学、法律、人文、医学、自然科学及工业和农业科学知识等。由于讲课者的特殊身份及授课内容的新颖,曾吸引了上千市民报名,后经教育局考试,最终录取了800人。教育局还曾计划为妇女提供育婴、家教、妇女卫生等方面知识的教育,后因经费问题而被迫放弃。

孙科对当时的市容环境卫生非常重视。责成卫生局划分“卫生责任区”,派专人负责,并定期向上级汇报责任区内的卫生状况。卫生局还雇用了1000名“环卫工人”,专门负责收集垃圾和清扫水沟。从1921年4—7月,共清除了126条水沟,约5万多米,还建立了一个近代化的污水排放系统。卫生局对公共健康也相当关注,为消灭传染病病源,曾在市区开展了灭蝇灭鼠运动,对餐馆、旅馆、戏院等公共场所的卫生管理也制定了新的规则。

广州市卫生局当时还规定医生、护士及牛奶坊、茶室和戏院要有执照。这项要求不仅便于行业管理,对大众健康也不无益处。卫

生局还严禁赌博和吸食鸦片,规定违犯的人必须受到严厉处罚。

在治安方面,孙科责成公安局保护市民安全,维持市区秩序,并建立了一支近5000人的警察队伍,这支队伍成为支持孙中山革命政府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。

正当孙科踌躇满志、一步步实现自己的市政建设计划时,1922年6月,陈炯明叛变。孙科为筹款讨陈而离开广州,其市政工作被迫中断。

1923年1月,陈炯明被驱逐出广州。2月,孙科回广州就任第二任市长,任期达一年半。这一时期,陈炯明及军阀刘震寰、杨希闵不断对广州进行封锁、骚扰,加之陈炯明逃离广州时将广州市政府存入广东省银行的备用现款100多万元洗劫一空,致使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十分困难。这样,孙科在第二任期内,将大部分精力用于为革命政府筹款上。

虽然如此,孙科仍不忘其司职,因而广州市政府各局工作仍有进展。公用局共修建了2200米长的道路,兴建了东山公园,并计划在观音山再修建一个公园。卫生局重点抓了饮水问题,同时还作了传染病的预防工作。教育局则为工人开设了职业学校,为文盲设立了暑期学校。

这一时期,孙科参与了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的改组工作,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

作了大量准备工作。

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,孙中山决定北上讨伐吴佩孚、孙传芳等军阀。为此,孙科受命去沈阳联络奉系张作霖,再次辞去广州市长职务。

1925年7月1日,广州国民政府成立,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孙科等16人为委员。随后广东省政府及广州市政府也都进行了改组。孙科被任命为省府委员、建设厅长兼广州市政委员长。这是孙科第三次出任广州市长。

在任期内,孙科仍着力于市政工程建设。新建了几千米长的现代化街道,为很多街道铺上了柏油,还计划修建新式医院,扩展自动电话、发展黄埔港。由于广东国民政府正积极准备北伐,军事上的需要排在第一位。所以广州市政建设的一些计划只好搁浅。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,1926年11月,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,孙科与国民党一些党政要人先行到武汉考察。这样,孙科辞去广州市政委员长的职务。

孙科在1921—1926年间,三次担任广州市长,他的关于广州建市的理论及实践,对后来民国时期的都市规划与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孙科拟定的《广州市组织条例》,实际上是一个组织法,它的颁布实行,成为民国时期都市建设的基本模式。

(上接第57页)昏。

70余载光阴倏忽而过。旅居美国长达半个世纪的于凤至,已于1990年3月20日病故在洛杉矶莱克瑞治路的林泉别墅。虽然她生前多次企盼回故乡

探亲,终因年迈体衰未能成行。但是于凤至婚后三回故里,特别是返乡葬母的最后悲壮一举,却留给乡人深刻的印象。

(图为于凤至女士遗墨)